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23

域外身体礼仪实践与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适应之旅

——基于《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

刘果,吴琦琦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基于《走向世界丛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基于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有分离又有整合,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一过程反映出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巨大压力时所作的努力。

关键词:文化适应;分离;整合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178-07

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陆续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求学、通商、考工、出使和游历,真正开始接触外部世界,身体力行地展开了跨文化传播实践。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对西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出国前还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与此同时,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也是异文化的象征,是西美尔所言的“陌生人”般的存在。因此,文化适应成为他们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身体礼仪作为身体行为的一种,与人类其他身体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不同特质的文化、制度和风俗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仪式象征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主体,对于同一种身体礼仪的理解与接受可能存在严重的分歧。与此同时,身体礼仪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沉淀的重要表征,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是跨文化交流中最为直观和常见的内容,因此,对于第一批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而言,使用何种身体礼仪是他们在异域游历生活中不容回避的难题。观察晚清知识分子的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是较为合适的研究切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一批真正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全貌。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走出国门的大多数人以游记或见闻录的形式留下了域外见闻的详实记录,涵盖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也包括了他们使用身体礼仪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图书,《走向世界丛书》以搜集1911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见闻实录为宗旨,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并产生巨

收稿日期:2023-02-23

作者简介:刘果(1973—),女,湖南长沙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出版与数字出版研究。

大的影响力^①。

《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游记作者涵盖出使官员、留洋学生、科学家、改良派等多种身份,他们详实生动地记载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或感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其中,也蕴含丰富多元的对身体礼仪实践的记载。因此以《走向世界丛书》作为本文展开研究的文献基础,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一 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与本文的研究视角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概念由文化人类学家莱底菲尔德提出,是指“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②。文化适应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他人如何交流,而文化适应则更加侧重于探究我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Change)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

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基于种族文化群体在两个维度上的取向——是否希望保持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是否愿意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构建了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将文化适应者的态度分为整合、分离、同化以及边缘化四种类型^③(见表 1)。

表 1 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

本民族文化认同		主流文化认同	
		是否愿意与主流文化成员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	
		是	否
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是	整合 (Integration)	分离 (Separation)
	否	同化 (Assimilation)	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

①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说它是“出版界的一巨大业绩”,又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认为“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②Redfield R, Linton R, M J Herskovits.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1): 149-152.

③Berry J W.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mado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Boulder: Westview, 1980, pp. 9-25.

④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ohn Berma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to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pp. 201-234.

⑤王开玺:《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她进一步指出,完整的文化适应应该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的文化适应,立足于观察异质文化接触之后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微观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则偏重于描述异质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④。

双维度的文化适应模型是被引用和使用最多的理论模型之一,因此本文的研究选择以这一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但同时更侧重于立足文化适应的心理或个体层面维度,研究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身处域外的身体礼仪实践,并试图透视他们在这些身体礼仪实践中的文化心理演变。

二 文化分离:以跪拜礼为代表的身体礼仪实践

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跪拜礼有着向受礼者表达崇高敬意的基本文化内涵,是尊重对方的最常见礼节,因此在不同场景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也成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体礼仪惯习^⑤。与此同时,跪拜礼又是最能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关于这项礼仪的争议,成了中国在 19 世纪接待西方国家使节时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访华还是晚清对外遣使,是否坚持跪拜礼,都曾引发热议。

经统计,《走向世界丛书》中涉及跪拜礼仪的文本共 120 处。其中,绝大多数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域外跪拜礼仪实践的叙事性记录。他们的主要记载者和践行者是出使官员。作为清王朝派遣出使的“可信”之人,出使官员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中国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对于异域文化,他们所产生的文化震惊与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也最为强烈。同时,

出使官员中的多数人,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如郭嵩焘、李鸿章等,他们写下的游记更容易在传统士大夫中传播开来,产生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出使官员在游记中对他们在域外践行跪拜礼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其在域外的跪拜礼仪实践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境下:

(1)重大节日及祭祀:据游记记载,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身处域外,但是在皇太后、皇上、皇后寿辰时,均会身着正装,面朝国家方向恭敬行使跪拜礼。如:“初十日癸丑恭遇慈禧皇太后万寿庆辰。卯正,由馆诣寓,随志、孙两软宪向北阙设香案,行三跪九叩礼。”^①“廿八日阴。辰正起,茶食后,公服至大厅,率英法僚属东向行礼,叩祝今上万寿圣节。”^②此外,每逢春节(文本中称为“元旦”)、冬至(文本中称为“长至节”)等重要节日,以及祭奠先祖时,他们也会使用传统的跪拜礼仪,如“同治九年庚午正月初一日在布都伯尔灵,行装向上行三跪九叩礼,恭贺元旦”^③。“三十日晴。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十三岁冥诞。辰正起,南向行礼”^④。

(2)使臣初到异国或回国:除重大节日及祭祀情境外,使臣初到异国或回国也会进行跪拜礼仪。使臣初到异国时,前任使臣需跪请圣安,如张德彝记,“戌正一刻,崇星使偕邵小村、蒋丹如、陈养元诸君到,李星使迎入,向东跪请圣安”^⑤。前任使臣回国时,也要行使跪拜礼。如薛福成所记,“刘芝田中丞启程归中国,盖将由巴黎赴马赛,登法公司轮船也。余在馆设香案,寄请圣安”^⑥。

(3)接收文书或呈递奏折:出使官员接收朝廷下达的文书或向朝廷上奏时,也仍会沿用跪拜礼仪,如曾纪泽“席散,北向行礼,拜发谢摺”^⑦。(拜摺:亦称“拜摺子”。清制,督抚以上有要事专折上奏,把折匣供在大堂香案上,对之行三跪九叩

礼,然后取交折差,高捧头上,开中门送出。拜摺时,属员站班,步兵排队,放炮奏乐,仪节隆重。)再如戴鸿慈所记,“是日摒挡一切,拜发前往德国日期摺一件。梁使寄请圣安如礼”^⑧。

由上观之,对于出使官员而言,跪拜礼仪的实施,并不因为身处异域而有所不同,因此其礼仪实践,与主体所处空间无关,却多与其政治使命、政治活动有关,是其政治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实际上,晚清出使官员虽身处域外,但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以跪拜礼仪的身体实践维系着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正如孙家毅所记,“在外三年,惟知谨慎……奉命而往,抱节而归,未敢逾越”^⑨。外交大臣郭嵩焘也提及,“吾以中国礼节行之外洋,求自尽礼而已”^⑩。在“身心一体”的中国传统身体观念下,跪拜礼仪成为晚清出使官员达成自身政治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他们作为传统文化恪守者的身份象征。

跨文化理论认为,在日常交流中,“我”会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把他人划分为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即我们与他们。这种划分会使个体产生对内群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从而指导着群体成员的身体实践。从跨文化传播视角来看,走向世界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具有清晰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再加上多年来受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其内群体界定理所当然地与其政治归属有关,指向君臣关系、效忠意识,方能与儒家主流文化高度契合而不至于产生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因此他们即使身处异域,也依然在一定的情境中沿用着以跪拜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礼仪,以维系自己与内群体的关联。强烈的内群体归属与认同意识,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身份鲜明的出使官员者)对于文化适应采取“分离”策略的重要驱动力。

①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15页。

②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5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57页。

③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④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5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4页。

⑤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42页。

⑥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8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3页。

⑦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5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2页。

⑧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9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73页。

⑨孙家毅:《孙家毅使西书略》,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⑩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4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36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随着君主专制的逐渐强化,等级权力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集体无意识。伴随着这一过程,跪拜礼仪初时的互相尊重与对等的涵义早已荡然无存,转而成为专制皇权压制群臣的一种身体规训,成为巩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制的有力手段。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人们的身體、行为和主体也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跪拜礼仪即使在异域也得以毫不失真地践行,其强大的力量使异域文化几无容身之地,恰恰说明权力制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的作用。换言之,文化亦是权力制度的产物之一。

此外,对于晚清出使官员来说,由于考察日记并不是自我内心独白和自我消费的个人作品,而是必须对外公开、随时接受统治阶级审视的“政治文书”,因此他们对跪拜这一身体礼仪的记载不得不慎之又慎,处处体现对主流文化的维护和坚守,其自我定位的基点和文化适应的态度是既坚定又清晰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

更进一步的“分离”则表现在他们手持自己的文化透镜,与异文化成员交往,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固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也很难对异文化给予客观的评价,表现出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是指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种文化,特别是面临文化冲突的时候,都会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提升本族文化的凝聚力,取得对他种文化的支配权。这一倾向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生活之初较为普遍的一种的文化心理。在长期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怀揣“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出洋考察“夷狄”的“奇技淫巧”,甚至欲“用夷变夏”。最早外出考工的林鍼将美国视为蛮荒之地,题诗:“蛮貊能将语意通,可知忠信此心同。”^①守旧派代表刘锡鸿出洋后有一段经典评论,“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

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②。深受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出国之初或片面夸大或扭曲文化细节将异域形象妖魔化,或强行为某些异域文化因素披上中国式外衣,显示了强烈的内向型意识。

这种文化心理将跨文化交流中的“我们”与“他们”置于对立和非平等的关系之中,对于早期出国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是卑劣的,“我们”不愿意与“他们”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凡此种种,皆为“分离型”文化适应的表现,只是这种“分离”还进一步添加了政治色彩,是权力话语的表征。

“礼仪本身包含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予遵守的道德与公德,人们只有不拘泥于表面的形式,真正使自己具备这种应有的道德观念,正确的礼仪才得以确立。”^③这一论断与西方的礼仪实践高度吻合。但是,正如孔子所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政治管理策略,中国士大夫的礼仪实践与他们的政治身份、家国情怀有了更多的关联,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良俗的体现。跪拜这一礼仪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也正基于此,这一身体礼仪的域外实践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也更为突出。换言之,在这一礼仪实践的背后,不仅仅是东西方道德理念的碰撞,更反映了中国政治文明在异域传播过程中的真实冲突与博弈。中国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做出“分离”的文化选择,在他们看来,就集体而言,是对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捍卫;就个体而言,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天下”君子理想人格的坚守。这样的心理动因,使得其文化选择具有必然性,我们在观照这一选择时,只有充分考虑其所处政治文化背景,方能真正做到“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进言之,这使得我们对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走出国门游历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跨文化交流的层面,更应该思考和考察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话语变迁和实践主体基于异域文化冲突的思想变革。

①林鍼:《西海纪游草》,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1页。

②刘锡鸿:《英轺私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9—130页。

③松平靖彦:《正确的礼仪》,转引自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三 文化整合:西式礼仪的初步实践与本民族文化反思

基于对《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外群体交往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西式礼仪实践,根据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西式礼仪的践行者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属于“整合”型文化适应。其身体礼仪实践主要包括鞠躬、免冠、握手等。

(1)鞠躬礼:鞠躬礼是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西式礼仪。1792年英国遣使马戛尔尼拒行跪拜礼仪,经中外多次磋商,决定自此以后双方遣使觐见帝王皆采取西式的鞠躬礼。进退三鞠躬也就成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觐见异国君主的身体礼仪。比如,如志刚随蒲安臣见法君拿破仑时,“国君立于三级下……使臣依次三进步,每步一鞠躬……蒲使将国书亲递于法君那波仑(拿破仑)第三亲接。礼毕,退三步,每步一鞠躬而出”^①。又如张德彝所记,“君主着乌衣,头戴白线花巾,当门正立。……三大臣先入,德尔贝立君主右,余立于左。星使入门鞠躬,君主答以鞠躬。凡三鞠躬至其前,相距数武。……郭星使前一步,递国书于君主。君主接过,转交德尔贝,置于案上。君主鞠躬……郭星使鞠躬答曰‘是’,后三鞠躬,退下楼,别众,入后堂,少坐待车”^②。以上所记均为受西方礼仪影响后中国政治身体礼仪的改良。

(2)免冠、握手:免冠礼和握手礼也是常见的西式见面礼仪。无论贫民百姓或是王公贵族,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这两种身体礼仪。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也进行了这两种身体礼仪实践。如薛福成所记,“须臾王出,免冠握手为礼”^③。斌椿也对免冠、握手礼进行了记录与介绍,“脱帽共称修礼节,袒怀何用设藩篱。……相见以握手为敬,不分男女也”等^④。

对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有的第一次走出国门,有的接连出使了数个西方国家,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远离”“我们”而去接触和了解“他们”,并进行了“他们”的身体礼仪实践。这种传

统身体礼仪和西式身体礼仪的交叉实践,让他们获得了对不同身体礼仪的“体认”,正是本民族文化与他人文化交互作用、并存不悖的结果。

基于对《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透过其中涉及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身体礼仪情感态度评价的100条文本,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在这些身体礼仪实践中的文化心理演变。即使是出使官员这一政治身份极为明显的群体,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们思想上的一些认识与变化:在文化比较中逐渐增进了对西洋礼仪的认同。“我们”开始愿意了解甚至学习“他们”,并开始愿意与“他们”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仍然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其文化适应选择从“分离”策略逐步转向“整合”:他们依旧手持自己的文化透镜,偶尔也愿意放下来去观察他者的礼仪文化,对异文化给予一些客观的评价。例如,志刚描述德国君民间相处坦然,“布君年七十三岁,精神矍铄,气象雄伟而质直,待人亲厚如家常。所居别官临通衢,时自楼窗外观。途人仰见,则免冠而过。又尝单车一仆,乘常车出入,遇者亦免冠而过而已。使者或遇诸途,为之鞠躬为礼,则摘冠相答。君民之间,相处坦如也。惟其临阵在朝,则严威严恪,人不敢慢”^⑤。黄遵宪记述日本明治维新后革除旧俗,“朝会皆大礼服,以免冠为礼。冠或肘挟,或手执。……新年朝贺,邻国公使皆在列。见客趋而前,皆握手通殷勤。入朝进退皆三鞠躬,无拜跪礼矣”等^⑥。就连守旧派代表刘锡鸿也承认,“向疑英人僻处海岛,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⑦。

从上述记载可知,鞠躬、握手等身体礼仪的政治意味有所减淡,因此容易作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礼仪的突破口。正基于此,我们看到,一些更为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身体礼仪实践为起点,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与其说他们否定的是中国传统礼仪,不如说

①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8—309页。

②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③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8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46页。

④斌椿:《海国胜游草》,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5页。

⑤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32页。

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3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22页。

⑦刘锡鸿:《英轺私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7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4页。

他们更愿意借此表达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全然放下了自己的文化透镜,对传统身体礼仪进行了审视、反思。比如,他们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培养的是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的是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因此应废除。又如梁启超对比了传统身体礼仪和西式身体礼仪的身形差别,“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偻,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并批评传统士大夫只知坚守传统礼仪、服饰等,“吾国士大夫之病,惟争体面,日日盘旋于外形。其国家之实利实权,则尽以予人而不惜;惟于毫无关轻重之形式与记号,则出死力以争之,是焉得为爱国矣乎?”^①

但我们仍然难以将这种文化选择视为“同化”。在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式中,“同化”是指“个体不愿意保持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但是,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域外游历中的文化适应,与贝利模式中的“同化”策略并不完全相同:其对更为平等、进步的西式礼仪的认同和对一部分旧有的不合时宜的传统礼仪的批判,仍然透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肯定与留恋。如戴鸿慈在游记中写道:“凡夫政教、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抽绎之,比较之,斟酌而选别之。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所适,文明输入,而不害于国粹之保存,所以得也。”^②以改服饰为例,康有为认为:“各国兵冠服皆殊,皆有其旧俗,随时改之,非学人也。今吾国人所见,皆英德物,遂若以为欧人皆然,则愚甚矣”“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岂知得失万端,盈虚相倚。观水流沙转,而预知崩决之必至。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③

这种文化选择,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有类似之处。费孝通先生反对亨廷顿提出的将不同文化由国家制度划定边界的“文明冲突论”,并引入“场”的概念纠正这一倾向。“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的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

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因此个体能够通过自主的选择,将文化冲突转变为文化互补,甚至走向文化融合。在“场”这一概念下,中西方文明均有其存在的意义,彼此间存在交集。由此,封建社会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必废弃自己的固有文化,可以依靠一种“文化自觉”,分辨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做出关于礼制、文化、社会形态的主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与先行者,其文化适应的态度更为理性和中允,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沿着这一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化适应之旅,文化互补、文化融合、文化互鉴得以展开。

由上观之,在政治意味不那么明显的其他身体礼仪实践中,中国士大夫表现出更为包容和积极的文化适应选择,这再次证明了通过个体与群体的跨文化实践,人类不同文化有可能达成共识和融合,而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使命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透过《走向世界丛书》所观察到的部分知识分子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整合”实践,固然受到当时国内渐成风气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影响,但这与他们走出国门在异域的“身体在场”有着更深刻的关联。跨文化传播学认为,作为“行走的符号”和“流动的文化载体”,“身体在场”能够唤起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共情”。因此能更好地实现不同文化交流。以《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容闳《西学东渐记》为例,作为第一位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挑战“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意识束缚负笈海外,四年的求学生活经历,使其在生活空间的接入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态度逐渐改变,并最终确立和选择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④”的文化适应观念。这再次反映了清政府选派赴美留学生这一举措的远见卓识和其对中西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当下,在全球文

①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62页,第591页。

②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9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95页。

③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8—139页、第235页。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2页。

化多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极富远见卓识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刻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①”。以“人”为载体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与认同,仍然是值得传承与借鉴的重要思路,是传播“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化观念、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的有效路径。

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变局中,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国门,走向域外寻找救国之道。他们把在域外进行的传统礼仪与西式礼仪的交叉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文化心理演变,融汇成一幅新

奇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以游记形式向我们做出了深刻的展示。对以跪拜礼仪为代表的传统礼仪的坚守,是原有主流文化深刻干预的结果,是旧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必然的折射。然而,在域外新鲜而陌生的空气中呼吸,必将催生新的文化适应。从分离走向整合,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做出的主动变革,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域外身体礼仪实践的可贵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过程的渐进性,在新旧文化的艰难博弈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值得肯定的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冲突与融合交汇的进程中所作的贡献与努力。

The Practice of Body Etiquette Abroad: The Cultural Acculturation Journey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Textual Review Based on *Towards the World Series*

LIU Guo & WU Qi-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owards the World Series*, investigat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body etiquette practice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further reflecting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behind this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accultu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of practitioners in this process, is both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and a typical cas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Berry's dual 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nt abroa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perienced both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Between maintaining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blending with other national cultures, they attempted to find a more moderate and feasible path to achieve their own cultural positioning, which reflected their efforts in the face of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of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年第6期。